

師道師說

名誉主编 汤一介 主编 王守常

中国文化书院八秩导师文集

许抗生

卷

许抗生 著 聂清 编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师道师说

中国文化书院八秩导师文集

名誉主编 汤一介

主 编 王守常

许抗生 卷

许抗生 著 聂清 编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师道师说: 许抗生卷/许抗生 著; 聂清 编.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11

(中国文化书院八秩导师文集)

ISBN 978-7-5060-8826-8

I. ①师… II. ①许… ②聂…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自然科学—文集 IV. ①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2424 号

师道师说: 许抗生卷

(SHIDAO SHISHUO: XU KANGSHENG JUAN)

作 者: 许抗生

编 者: 聂 清

责任编辑: 王 艳 张 爽 黄 佩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3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826-8

定 价: 49.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0829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

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名誉主编：汤一介

主 编：王守常

副 主 编：李中华 魏常海 苑天舒 江 力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尧	王守常	方立天	乐黛云	刘梦溪
江 力	汤一介	孙长江	杜维明	杨 辛
李中华	李学勤	李泽厚	吴良镛	余敦康
张立文	陈越光	苑天舒	林 娅	欧阳中石
庞 朴	谢 龙	戴 逸	魏常海	

组织编辑：中国文化书院

中国文化书院简介

中国文化书院由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羨林、朱伯崑、汤一介、庞朴、李泽厚、乐黛云、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等共同发起，以及杜维明、傅伟勋、陈鼓应等港台及海外著名学者共同创建，于1984年10月在北京正式成立。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阐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走向中国作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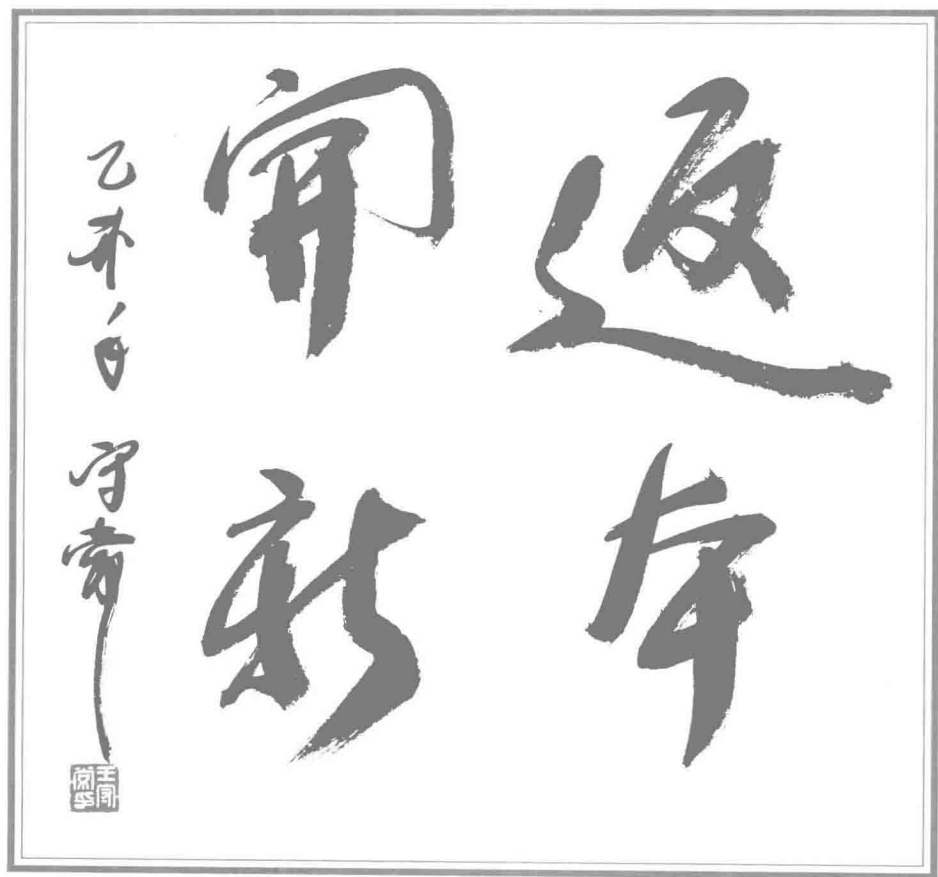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湯一介敬題

壬辰年冬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题词：

北宋张载“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先生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题词：

“返本开新”。

总序一

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于1984年，是一所在众多老一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先生的支持下，由一批中青年学者办起来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到今年（2011）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一个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艰难的情况下，能坚持下来，而且对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多多少少出了点力，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自1949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也可以算是一件新事物。据我所知，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不能算1949年后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大概也是最早办起来的少数几个中的一个了。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新办书院，并恢复了多所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书院。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

我认为，对中国文化书院来说，也许最为宝贵的是，书院集合了一批有志发展和创新中国文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老一代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他们的学术风范，无疑是当时维系书院的精神力量。1984年底，文化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开会，当时我们没有院址，也没有什么经费。任继愈先生说：“草棚大学可以办，我们连草棚都没有也要办。”因此，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借青年干部学院场地举办了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这次讲习班是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当时梁先生已经88岁了。我们请他坐着讲，而梁先生一定要站着讲，他说这是一种规范。梁先生在演讲中高声地说：“我是一

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这对在场二百多名听众是极大的鼓舞，也给了中国文化书院在风风雨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支持下去的一种精神力量。

一个希望在中国发生良好作用的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群体。中国文化书院在走过的二十多年中虽然存在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却是一个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风气的团体。例如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持激进批判态度的青年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中坚力量。这些在文化问题上具有不同认识的学者集合在一起，虽然对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考虑有所不同，但他们所抱有的一种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愿望则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书院也和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团体和非学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队伍中不仅有众多的我国第一流学者，而且还聘请了一批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导师。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们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

历程。

在我们编辑的过程中，江力同志出力颇多，东方出版社的同仁给予大力支持，并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特此致谢。

汤一介

2011年12月1日

注：此序为汤一介先生为《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所作。

总序二

斗转星移，历史沧桑，时间过得真快，去年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化书院九秩文集》，而今年就着手编辑《八秩文集》。我们在编辑这两部丛书的时候，似乎在重新认识、理解二十世纪的“学人生活史”。

我曾经多次谈过，中国文化书院已逝去的90岁以上的导师，他们用生命写就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恢弘的著作，指引着后辈学者的学术前行。

我想，如没有这辈学者融会中学与西学，从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于人文、社会学科建构了中国学术范式，我不知道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该如何发展？

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在欧风浸荡下的国难中，他们以一己之学术良知与社会担当去拯救中国，他们有过幸福，有过迷茫，有过痛苦，有过期盼，相继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带着“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的追问，离开了这个让他们梦牵不舍的祖国。

读其书，念其人，思其学，心会痛！

而今编辑《八秩文集》时。我熟悉的这代学者在这寒冷的深夜一一呈现眼前！

他们大多生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又在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左右相继去世。今天，健在学者已是花果飘零。读这代学人的学术生活史，更令我有扼腕之叹！

他们在中学毕业时代满怀喜悦且自责的心态去迎接新中国的建设。尔后在“左倾”思潮的一浪接一浪中，不断否定自我价值，努力改造自己心中的“小资产阶级王国”。在那求新求变的荒诞年代，没有一座安静书房容纳了他们承接前辈父辈的学业，以便更好地投身于新中国的

建设大潮中。纠结且痛苦，让他们在中年时代，荒废了他们的学识智慧。

好在充满“思想启蒙”、“文艺复兴”气象的梦幻般的八十年代，又燃起他们的文化自觉。

他们像孩子般似的夜以继日“补课”。他们在思考西方学术的理论与方法，并理性地批评扬弃；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承继前贤学术成果，且又开创了新的研究课题方向。同时他们针对社会丧失文化的主体性及自我价值的根源，作出深刻反思并发出肺腑之言。

作为学生的我，在课堂、在各讲座中经常听到他们最爱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深切地知道，他们矢志不渝地践行他们的人文关怀。

我不禁要问，如果没有这一辈学者，二十一世纪学术如何延续与发展？我开始思考，在今天全球化思潮的中国人，如何“返本开新”，如何做到文化自觉、自信、自强？

在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三十周年之际，编辑《八秩导师文集》，每每想到这辈导师的声容与教诲，我不敢懈怠！

唯有坚持，唯有努力，唯有守正，让中国文化书院面向历史，立足现在，走向未来。

谢谢我敬爱的导师！谢谢你们带着我们，带着温暖的光明的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了家”。

让我们可以告慰——“这个世界会好起来的！”

王守常

2014年12月10日深夜谨识

我的治学小史（代序）

许抗生

我出生于江苏武进县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我父亲许文珍一直从事小学教师的工作，母亲汤荣官在家操持家务。父亲为人忠厚，深得乡亲们的敬重。我们兄弟姊妹共四人。大姊许祖华，二姊许祖英，哥哥许作民和我，我是最小的。由于我们的父亲是教师，所以我家十分重视孩子的上学读书，父母总想让我们多读一些书，多上一天学。但当时由于家贫，无法让孩子多上学，所以大姊二姊都只上了小学就辍学了，大姊在家务农，二姊进了工厂做工，幸运的是新中国成立了，大姊二姊都得以重新上学。大姊上了新苏师范学校，二姊上了南京大学的工农速成中学，后来速中毕业后，又考入南京化工学院上了大学。我的哥哥则进了上海交通专科学校，之后这一学校并入南京工学院，我哥得以在南京工学院专修科毕业。我是四人中最幸福的一个，由于我是在新中国的红旗下长大的，所以我上的学是最多的。我于1953年在我家乡中学（厚余中学）初中毕业后，我即考上了省立常州高级中学求学，并于1956年毕业。毕业后，学校派送我到北京俄语学院的留苏预备部学俄语，准备留学苏联的，学了一年多俄语后，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开始趋于紧张，所以我们这批人就不再留苏，而分配到本国各大学继续上学，我则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我之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也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所造成的。我本来是想学理工科的，尤其在高中时我很想当一名地质工作者，能跑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为国家找出地下的宝藏的。当然我这一想法当时也是很天真的，但是不幸的是我当时在留苏预备部学习期间得了视神经炎，几乎看不清东西，幸亏经过了中医研究院的韦玉英大夫和其父韦文贵两人的治疗，得以重见光明。但眼睛已不可能治愈，后来从

原来的视神经炎变成视神经部分萎缩症，所以也就不可能再学习地质学，只好转向学文科了。至于上文科学什么专业呢？当时也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只是听人介绍说，哲学是既要学社会科学，又要学自然科学的，我感到两方面都学而不偏废某方面，这是比较好的，这样我就要求转入哲学系学习。可见当时我对哲学的理解是十分肤浅的。自我1958年9月入北大哲学系学习开始，先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之后学习西方哲学史，接着上了中国哲学史的课，渐渐地开始对哲学产生了兴趣。自我听了汤一介老师、邓艾民老师和朱伯崑老师为我们教授的中国哲学史后，我开始对中国哲学有了兴趣，感到中国哲学十分亲切，与西方哲学相比，更有亲切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尤其是老子的哲学，他的深奥的哲理更是吸引了我，自此我开始较多地注意与学习中国哲学史。1963年上学年在撰写大学毕业论文时，我即选择了汤一介老师指导的有关王弼《老子注》中“动静观思想研究”课题。论文完成后，得到了汤一介老师好评与鼓励。由此我大学毕业后，报考了汤用彤先生的研究生，攻读中国佛教哲学。汤老当时已经病重，坚持在病榻上为我讲解佛学，其时的情景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不幸的是汤老于1964年病逝，永远离开了我们。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没能在汤老的指导下，读完研究生。之后，我的研究生学习转由任继愈先生指导。但时间不长，“文化大革命”即爆发，中止了我的一切学习和研究。后又去了部队农场锻炼，接着又把我分配到大兴县一个乡村初中教书，直至197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经过汤一介老师的努力推荐，才把我从农村郊区调回北大，让我与孙长江老师一起当冯友兰先生的助手。其时尚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谈不上什么正常的教学与科研。真正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逐步恢复起来的。在这十年中，我的主要收获是解决了我的个人生活问题，在1966年我与杨雅彬同志结了婚，并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杨雅彬同志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研究基督教的工作。由于当时我的指导老师是世界宗教所所长任继愈先生，所以我也在宗教所跟着任先生学习佛教，这样我和杨雅彬同志，也就开始相识，逐步地互相了

解了对方，在交往中产生了感情，并于1966年结婚。“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开始恢复研究工作，杨雅彬也从世界宗教研究所调到院部，从事社科院研究人员的全国招聘工作。招聘结束后，她又转入新成立的社会学所从事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并曾任社会学所副所长，成为了一位在社会学界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学家。我们二人各自从事着自己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同时又有一些共同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会互相讨论一些问题，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我们的家庭是美满融洽的。

我之真正走上学术研究的路，应当说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开始的。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先秦名家研究》，就是在1977年至1978年之间写成的。从这一时间算起，直至今日，我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思想的研究，可说也有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大致我经历了这样三个时期：第一段时期，主要是做研究的基本功，打基础时期，即主要是学着做校勘、注释、今译等工作，也就是说做“小学”的功夫。我较集中地做这一工作的，大致在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即1977年到1985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中，主要做了《公孙龙子》的注解和《帛书老子注释与研究》以及参加《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稿》的工作等。至于为什么我要先做这些研究的基本功呢？这是因为我意识到这上面的功夫我是很欠缺的，而不做这些基本功，就很难读懂我国哲学的原著，也就不可能很好地做好今后的思想研究的工作。我之所以能这样做，也是与我的导师任继愈先生的教导分不开的。任先生经常告诫我们年轻人，做学问首先要下功夫读书，打好扎实的基本功，不要浮躁，不要忙着发表文章，坐不下来。见到一些年轻人匆匆忙忙地发表文章，任先生总是告诫我们不要学这些人的做法，要沉住气，做扎实的功夫。他还告诉我们，要真正读懂中国古代哲学或佛教的原著，最好是自己动手做一做古代典籍的注释和今译的工作，并认为写文章与做注释与今译工作不同，写文章可以跳过自己对原著不懂的地方，做注释与今译就必须对原著的一字一句都读懂才行。所以，要读懂古代典籍，最好从做注解和今译工作做起。任先生尤其特别重视古籍的今译工作，他

认为做今译要比做注释更进一步，做注释需要读懂原著，而做今译则更要在读懂原著的基础上，用现代的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现代人也能看懂。任先生在今译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在佛教典籍方面，他做了《物不迁论今译》《不真空论今译》和《般若无知论今译》等，在老子的道家研究方面，他做了《老子今译》，并前后做了多次修改与补充，做得十分认真。由此可见任先生对古代典籍今译的重视。就这样我在任先生思想影响下，在研究古代哲学思想之前，先做起了注释与今译的工作。那么先从哪一本古籍做起呢？这里有一个选择的工作，古代典籍众多，我感到还是从部头小的，数字少的典籍做起，对于部头大的著作不容易一下子做完，所以我选择了从文字较少而又富有哲理的著作《公孙龙子》做起。公孙龙提出了一反常识的“白马非马”的命题，而这一反常识的命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呢？对这一命题究竟又是如何加以论证的呢？我们又能在这一理论思维中吸取些什么样的思维教训呢？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当时对我很有吸引力，很有些兴趣，于是我就在1977年至1978年年中，对《公孙龙子》作了注解，并在此基础上还完成了《先秦名家研究》一书的初稿。但是《公孙龙子》虽说篇幅较短，却哲学思辨性强，文字又十分晦涩难懂，我写出了初稿之后总感心中无数，我的注释是否准确，我对公孙龙的观点能否成立，这一切心中无底，希望有人给我把把关。这样我就想到张岱年先生，张先生平时总是热情地帮助我们在学业上的成长的，当时很想希望张先生能先看一看我的书稿，给我把把关，提些修改意见，但又怕耽误了他的宝贵时间，为难了他，等到我把书稿送给张先生时，他却欣然答应了，并表示要好好地看看我的稿子，这样我的疑虑也就顿时消失了。我记得当时张先生看得很认真，并把大大小小的修改意见都写在一页纸上交给我，要我再作认真的修改。可惜张先生的这些文字我没能保存下来作为纪念。当时我在该书的后记中说：“这本书……于1977年至1978年间写成的。初稿写成以后，张岱年先生给予了热情的关怀，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确实，我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这样在张先生的热情的支持、鼓励和具体的帮助下写成的。书稿完成之后，张先生又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序言。他在《序》

中说：“许抗生同志留心钻研名家学说，历有年数，近写成《先秦名家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于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的学说，进行比较细密的研究，对于儒墨道法诸家与名家的争论，也作比较详备的叙述，取材丰富，论断允当，有独特之处，是一部有价值的哲学史著作。”张先生对我的处女作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是对我的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序》中又说：“看到年轻同志写出这样具有较高水平的著作，我是感到非常高兴的。”当时张先生把我看作是位“年轻同志”，其实我当时已经是过了“不惑之年”的中年人了，只是在张先生眼里我尚是年轻的。书成之后，还是多亏了张先生的大力推荐，最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正式出版的。

《先秦名家研究》是我完成的第一部习作，该书基本上包括两部分的内容，第一编是名家学派研究，第二编是《公孙龙子》注释与解义。名家学派研究主要考察了名家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着重分析了惠施“合同异”的哲学思想和公孙龙的“离坚白”的哲学思想，尤其是探讨了公孙龙如何从“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的政治目的出发，坚持了“名应当实”名实相符的逻辑学说，而最终由于不懂得名与实的辩证关系、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学说，而得出了诡辩的“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的思想，把一般（如马、坚、白等）看作是可以脱离个别，独立于个别存在某一地方的东西，从而弄乱了名实关系。这一理论思维的教训，我们是应当很好记取的。至于在第二编《公孙龙子》注解与解义中，我根据公孙龙哲学应有的思想逻辑次序把原有的篇次作了调整。原书的次序是《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现改为《名实论》《白马论》《通变论》《坚白论》《指物论》《迹府》。从公孙龙的思路逻辑来看，应当首先讨论的是名实论问题，所以我把《名实论》放在首篇，由名实论的名应当实出发，公孙龙发现名实之间有差异有区别而名不能当实（白马之名只与白马之实相符，而白马与马两者不相符），从而得出了“白马非马”的结论，所以我把《白马论》列于第二篇。接着继续讨论名实关系，讨论了事物关系发生变化时，名实关系是否会变化的问题，所以《通变论》列第三篇。如果说《名实